

读者参考

丛书

100

减速的代价

◎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

◎“隐形税”更值得关注 ◎中国面临医院管理缺失难题

◎我们为什么需要律师

◎塑造未来的10个创意 ◎上海：“未富先老”城市的年金试验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学林出版社



读者参考

丛书

1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减速的代价 / 《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8

(读者参考丛书 / 林雨主编; 100)

ISBN 978-7-5486-0193-7

I. ①减…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中国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0515 号

本书资料除编者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文字以外,所用图文资料
均标明出处及作者。转录图文均酌付稿酬。有未及奉达者,请即与我
编辑部联系。

减速的代价

读者参考丛书(100)		2011 年 8 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天 水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电话:021-64084572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 万
ISBN 978-7-5486-0193-7/Z·13		定价:13.00 元

读者参考丛书
(100)

减速的代价

目录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1
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	4
中国如何凝聚人心	6
对人民负责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11
非物质经济增长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14

世界金融经济对中国的影响	18
郑永年:拉登之死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20
中国不同于世界的十大理由	23
“技术换市场”27年反思录	26
中国政府的免债地图	28

新兴国家的社会难题	31
阿拉伯,一场本色革命	34

何时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36
三万亿外汇储备能干什么	39
减速的代价	41
加息周期进入下半场	43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穷”	45
我们的财富到哪儿去了	47
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49
执政者如何面对社会心态	51

谁有征税权	54
“隐形税”更值得关注	5
稿费税是否在“惩罚写作”	57

三峡工程:重要的是善后和善用	59
三峡大坝的成本如何计算	62
我为何炮轰长沙面子工程	64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贛小苏: 住房问题已影响全局,必须解决	46
--------------------------------------	----

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等于变相加税	67
“买房不如租房”时代来临?	70
“泄密”助长中国股市内幕交易	73
中国股市的“小非潜规则”	27
A股:艰难的寻底	75
被宠坏的投行	80
婚姻并未过时	82
中国式浪漫	84
男人和女人	172
做个实用主义男人	85
单身焦虑下婚恋新动向	87
李光耀:刺猬还是狐狸?	89
“财经女侠”叶檀	91
我的语文为何比数学好	94
聂卫平和他的师友们	97
“科学狂人”丁肇中	100
被虚构的李鸿章	102
人生	38
什么是爱	105
人生需要让利	30
人生是一盘无须做大的小生意	65
在一个时代里缓慢行走	106
当代中国青年,脱胎换骨的一代	107
青少年心中的性与爱	109
从抢盐看国民心智之不成熟	44
中国面临医院管理缺失难题	112
清华百年:科学与政治之间	116
童年的消逝	120
“一定要多学些没用的事”	17

特鲁姆普	121
马勒之死	123
谜一样的民谣诗人	127
中外著名电影人谈中国电影	130
影视剧改变了关于明清的普遍知识	129
艰难的文化	139
“知识分子的没落是个世界性现象” ——对话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王汎森	133
金钱对艺术的致命诱拐	68
他们的“中国”	145
邓小平:蒋经国死得太早了	148
毛泽东最早选定的首都	150
邓小平认错	149
国民政府选址之谜	151
纳吉何以被纪念	155
锻造爱国与批评的合金钢	161
谁杀死了故乡	158
向西看的那个槛	163
我们为什么需要律师	125
新法释疑:房子票子孩子	166
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一个人吗	170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	175
没了蜜蜂,人类只能存活四年?	178
中国人的科学生活	182
世界七大最极端实验室	189

塑造未来的十大创意

——世界知名科学家预测 2100 年人类生活

.....	185
中国的 J-15“飞鲨”	179
五角大楼与好莱坞的神秘关系	71
中国航母战略冷思考	202
上海:“未富先老”城市的年金试验	191
北京的“大院生态”	197
看广东反腐如何监督一把手	199
微博、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	207
大城市可以这样亲民	215
新移民何以成了港人眼中的“蝗虫”	217
港大百年校庆“很低调很学术”	219
海外移民陷阱重重	222
中国人留学代价有多大	229
加藤嘉一:中国人有十大不可思议	200
“中国泡沫”是世界经济最大风险	190
中国需要民主,但必须是渐进的	232
美国人为何抵制医改	196
美国式道理	3
善于取长补短的丹麦人	52
另一种崛起	227
德国女性坦对更年期	213
西班牙斗牛士只剩几百人	221
贪婪的海绵——以色列窃水没商量	173
个税调整应考虑购房负担	13
反腐新动向:权权交易	92
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9
官员理当承担政治伦理责任	25

维权成本高于违法成本	99
内地 70 万退休高工陷养老困境	235
六成网友称医改基本无效	240
“其他支出”掩护着哪些支出	205

一流食品出口二流食品内销？	242
少吃可以更长寿？	206
孤独伤身	245
老人最怕十个动作	244
不同型失眠者的助眠方法	22
生活中最廉价的防癌处方	248
抗菌药能用老就不用新	10
六类药的意外好处	101
压力有十个无声信号	188
性格影响健康	237
重建食物常识	241
我们喝茶错误不少	239
当你点上一支烟	181
日常生活如何预防亚硝酸盐	61
碘片该不该服	95

中国十大名茶	249
酒的起源	113
旧时征婚啥标准	40

今日说法	35、50、58、63、74、79 81、147、160、169、220
------------	---

封面图片 沙 漠
图片提供 林 路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赵 杨 司 敏

幸福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

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

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干涉他们的私领域。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其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

孙立平，著名社会学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关注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以观点新锐、犀利著称。2006年被《南风窗》杂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日前，孙立平走进广东省委常委会集中学习讨论会，给广东省委、政府、人大、政协、法检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做了题为《关于提升幸福感的几个问题》的辅导报告。

不要“被幸福”

记者：您怎样定义幸福？

孙立平：以北京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北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北京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一个小时。

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

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入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

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而我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包括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

态。

公平正义主线

记者：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孙立平：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

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社会进步运动

记者：您认为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应当在提升幸福感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孙立平：我觉得这是边界的问题。比如幸福，政府关注人们的幸福感，但不能进入人们的私生活领域。如果两口子吵架，他们感觉不幸福了，政府去制止这两口子吵架，这就涉及权力扩张的问题。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而干涉他们的私领域。因为，有自由才有幸福。在这个自由的空间当中，社会能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

记者：您曾提出“社会溃败论”，认为维护公平正义面临很多困难，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政治框架的影响等。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孙立平：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比如当年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腐

美国式道理

□林蒙蒙

一位少年，酷爱小提琴，却为不能成名而苦恼。老琴师把少年带到自家的花园里说：“世上有两种花，一种花能结果，一种花不能结果。不能结果的花更加美丽，它们在阳光下开放，没有目的，只为快乐，快乐本身就是成功啊。”少年深受触动，他仍然常拉小提琴，但不再求成名，只为快乐。这位少年叫爱因斯坦。

美国社会的几条“潜规则”：不吃早餐的人不能委以重任，一个连自己健康都不在意的人不会在意任何项目的细节；每个人都要有个骨灰级的爱好；帮助老人，上帝会记住你的行为；永远尊重知识分子，说不定哪天你要为他打工；少吃快餐多吃青菜，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父

母不需要你赡养但需要你关爱。

美国人的思维：为倒时差，他去超市买一瓶红酒，结果，付账要求看他驾照。“麻烦您，看我都有白头发了，我像不到18岁的吗？”服务生：“如果我有的查，有的不查，我就有歧视之嫌。”

必有过人之处：记者张泉灵写道：“冷清的街道，不够炫的商店。我一直在想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过人之处在哪里。”朋友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在芝加哥看电影，银幕上莫名出现字幕，挡了一部分画面……正奇怪，散场时，门口有工作人员发免费票券，抱歉道：“今天有两位聋哑观众，所以要上字幕。影响大家，欢迎免费再来。”

（摘自《创业天下》）

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但是它通过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使社会得到了重要改变。这三个步骤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通过这些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

制。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据《南方日报》）

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

□赵继成

2009年,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出版的《民主的细节》被一些读者推崇为“中国近年来最好的民主启蒙读物”。2010年9月,这位女学者回到北京,成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身处北京的近距离观察,她对中国当前的改革和社会状况又有了哪些新的思考?

在政治转型中利益群体的意见表达非常重要,2010年一年很受关注的现象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发言,你怎么看?

刘瑜:微博像我们的一个信息绿洲,是好事。中国的转型与以往转型国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了网络的力量。也许历史、文化的包袱使得中国的转型比较艰难,但互联网的出现,给社会变革打开一个缝隙。经常有事情都是先从互联网上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媒体再跟上了。

改革现在面临很难突破的壁垒,改不动怎么办?

刘瑜:如果看其他国家转型的历史,会发现制度都是有缝隙的,比如互联网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缝隙。拆迁条例能够修改,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呐喊是有关系的。就算

没有直接的政治行动,闷声发财挣钱、积累民间财富、读书思考、搞慈善公益、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媒体,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深远的政治后果。无论看中国还是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你都会发现,人的政治观念是随着社会财富增长、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的。

有人去农村做调查,发现那些有抗争精神的反而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漠然。

刘瑜:一方面可能是老人们更有时间去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政治运动和“集体活动”,那种经历至少培养了他们的一种公共意识。

这个状况到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很多人不会再自然地站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

刘瑜:“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天然地就是“国家意识”,那些给奥运会做志愿者的孩子们,那种公共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

但是另一种公共意识,在我看

“隐形税”更值得关注

□张 雷

除了备受关注的个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提醒说,无处不在的“隐形税”其实更值得关注。

据记者调查,我国的税收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前者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是月月缴;后者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城建税和营业税等,是天天缴。间接税也可称为“隐形税”,是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的。

比如,一个消费者在商场花500元买了一套西装,其中就涵盖了17%的增值税和13%的营业税;买包8元的香烟,其中约有4.7元缴纳了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都以直接税为主,直接税税额占总税收额的比重都超过60%。

而我国则相反:2010年我国税收总额为7.7万亿元,其中4.5万亿元是间接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间接税的比重确实偏高。”张斌说。

专家认为,我国间接税有两大特点:转嫁性和隐蔽性。间接税多为税务部门直接面对企业征收,操作起来相对简便,而实际上,众多消费者才是间接税的主要负担者;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大多数纳税人对这些税种并不知情。至于隐蔽性,则体现在“税收藏在价格中”。在发达国家,到超市买东西,购物小票上会清晰地注明顾客为这种商品支付了多少税,而我国仍未施行。

因此,专家认为,要让老百姓纳税纳得明明白白。

(摘自《环球人物》)

来也很重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就是“社会意识”和“民间意识”,为民间的弱势群体、弱势个体发出声音的公共意识。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基金的梁晓燕女士告诉我,有不少80后志愿者在给这个基金工作,跑到西部最穷的地方去帮助农村教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的青

年,这样的人也还是有的。

一点点进步也是进步。而且我觉得,长远来看,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因为这样的进步才是有根基的,而不是辛亥革命那样,社会一夜之间“被进步”了,但是基层社会还是麻木保守和死气沉沉。

(摘自《南方都市报》)

中国如何凝聚人心

□ 芦 荻

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很安全，“放心吧，政府在给你看着”，而不是现在有时候你要去看着某个政府。

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任剑涛的高速话语在一个多小时内几乎从未停歇。任剑涛的辩才颇负盛名：在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之前，他曾任中山大学辩论队教练，率队获得第六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

但他更多时候还是以政治学者的身份出现。专长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任剑涛，近几年来对于中国的国家价值观的重塑颇多论述。他对本刊说：“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重新让人心凝聚起来。今天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形式存在，但是缺乏精神和灵魂。”

2008年，有学者邀其一起为“中国模式”增色时，他却“不合时宜”地谈论了这个问题并尝试开出自己的药方：建构国家哲学。

“兜底的价值观念”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是国家哲学？

任剑涛：国家哲学是关于怎么提供一个总体政治组织的理论和一個总体的社会理论，简单地讲，就是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是什么？

任剑涛：国家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念成为国家运作的共同精神基础？

国家哲学是以中立、中性的特点，寻求能够整合中国公民，或至少是绝大多数公民，能够保证国家认同的理念。但它不是来自传统的阶级，也不是来自传统的主义话语，更不是来自权力的施加，这三个相加就是意识形态的取向。

中国有一种表述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不够。目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性不够，换言之，是中立性不够。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经济领域选择唯优是举，替代了传统的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邓小平非常准确地指出，市场既可以姓资也可以姓社。这就是一个中立性的进步。可以说经济改革是国家哲学上的有限突破，现实也证明了其效果。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来看，它并不比所谓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要差，

而甚至要求更高？

任剑涛：它可能对统治阶级（比如对执政党的党员）是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但是有时对于组织外的广大公民来说有些太高、太远。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时候轮不到他来做高度的判断。这使得国家精神没有办法深入到社会底层、打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因而使得国家的高端秩序和日常秩序在精神层面产生断裂。

普通公民关心的，正如温总理所说的，我是不是安心、放心、舒心。“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和普通公民的关系在哪里？就在于，这些法律会不会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安心、放心、舒心的生活状态。

从日常生活上，承认安心生活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这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从革命时代开始，我们的党对国家哲学的承诺是培养、造就人民为崇高的人，最终达到共产主义新人的目标，这个目标太神圣伟大了，而千百年来人性的基本状态几乎没有改变。

国家哲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的基本理念是不是有最大多数的居民乐意认同、理性认同。这样就会使得国家的精神基础得以整合，而不是在精神上一盘散沙。其次，国家哲学在秩序上提供贴近日常生活的准则，我把它称为“兜底的价值观念”。

事实上，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价值，因为现在连这一点大家都不信守了，像三聚氰胺、瘦肉精事件频频发生，就是因为兜底的价值观念出了问题。

这不是精英和少数人内部的选择

《瞭望东方周刊》：为何在此时提出建构国家哲学？

任剑涛：今天看国家哲学的重建，是到了一个选择的关头。这不是精英和少数人内部的选择，而是一个庞大的多元社会整体的选择。这个选择因市场经济的推动而兴起，经过三十年的积累，现在已经到了不选择不行的时候。

革命时期，革命党用革命理念在政治上寻找最大的同心圆。那个时候，革命党的国家哲学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内部，比如党内极左派挑战党内改革派，这是少数人的挑战，是精英的挑战。但和平年代，更大的挑战来自大众，他们愿不愿意跟随国家哲学的主流呢？这样，国家哲学对社会公众的交代就不是革命党内部的维持革命理想的问题，而是革命对社会的承诺能不能兑现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中国的国家哲学的历史转变？

任剑涛：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过程，就是国家哲学重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执政理念的转变是积

极的,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脉络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要从革命党转变到执政党的国家哲学。

从演变主流来看,执政党正在变得游刃有余,具有弹性。比如社区自治,这个概念的出现,尤其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和基层自治结合,说明决策层面已经意识到国家和社会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政治和行政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是国家哲学的良性转变,但现实情况是,还有某些方面和这些目标是有距离的,有时候甚至是背离的?

任剑涛:这就是重建国家哲学必要性的显现。我们国家的制度跟进远远落后于社会转变的速度。社会经过市场经济的刺激已经变成了竞争性社会,但是在管理上还是单纯依靠行政层级向下施加命令。

胡锦涛总书记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从党内民主推向社会民主,再和国家民主匹配,这是很理想的过程,也是我们党正在努力的。但是具体怎么演变、夯实,需要一个细致

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精神层面就叫国家哲学的重构。

制度怎么关爱我?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哲学和政改之间是什么关系?

任剑涛:政改是新的国家哲学兑现的结果,而不是以政改来形成新的国家哲学,应该以国家哲学引导政改。政改经常被认为事关国家前途命运,但不是这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那应该如何看待政改?

任剑涛:对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和执政者,如何通过有效、良性的机制促进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执政党和执政者的事。讨论政改,不是讨论谁来做主,而是讨论这个做主的怎样做好主。

公众的基本要求其实是很低的,制度上就要满足这个最低的基本要求。然后怎么更好,都是可以讨论和改进的。如果连基本要求也不能满足,这种社会就会形成高度政治化的状况,执政者为维持秩序就会非常紧张。

所以国家哲学应从政治生活退后到社会生活,再从社会生活退后到日常生活。国家就是要解决公众维持日常生活的安全感和尊重感。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很安全,“放心吧,政府在给你看着”,而不是现在有时候你要去看着某个政府。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如何退后?

任剑涛：国家哲学要解决的制度布局问题是日常性制度，跟日常生活有关的制度，比如基层社区怎么工作，基层权力结构怎么运作，权力在总体上怎么对待人民。

制度怎么关爱我？春节、地震、偶发性事件的时候关怀我，让我感激涕零，这些不解决问题。偶发性的关爱，是一时的道德冲动的产物，但是作为一个制度的日常安排，是指人民的要求可以限制住制度的猖狂，并且在制度安排中得到满足。

要通过一套法治和制度安排，提供“恭敬”的社会行政服务。不只是简单通过政治的宏大布局，比如市政厅联署办公，这还是革命党的思维。公众真正需要的，是你效率高一些，程序妥当一些，我付出的成本小一些，你尊重我一些。这些要求是非常利益化、非常琐碎的。只要你把那些细皮碎毛的东西给处理好，把琐碎的作为革命党不屑的事情处理好。

像强拆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法律层面的这些细碎的内容没有构建好，所以一个社会事件、行政事件有时候会上升为政治事件和国家事件。

《瞭望东方周刊》：还是要转变执政思维的问题。

任剑涛：一个国家哲学在制度层面上的理性投射，应该是反映局部的、个别的、因时因地的、细致的行政艺术，而不是宏大的全民运动式的政治气魄。

国家和社会的转变对执政党是历史性的考验。我们习惯了革命党的举国体制，习惯了在一切事情上支付政治成本。比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气势恢宏，震人心魄。

奇怪的是，如此巨大的国家行动处理得很漂亮，但是就连拆迁，一两座房子的小事，都变成了我们国家危言耸听的大事，以至于有时候要放到维稳乃至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上来讨论。这是非常奇怪的倒置。

有些人老是觉得群体性事件就是要推翻社会秩序，这是错的，这些群众丝毫没有推翻社会秩序的任何意愿，更不要说政治意愿了。这么想，等于是让对手借助日常组织的空间来积聚反对自己的力量。所以，在统治问题不必要成为国家哲学日常制度体现时，应该尽量把群体性事件当成纯粹的个案处理。

建立一个中立性的国家哲学

《瞭望东方周刊》：其实共识不能说没有，比如中央这些年来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

任剑涛：这种现象应该解读为两个分裂：一个是国家哲学建构的过程中，理念和制度没有匹配。再强调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你还是从用权施政的角度来考虑，是在强调权力的道德观，而没有强调权力的制度观。依靠道德能力和认知能力，每个人差别很大。现在没有